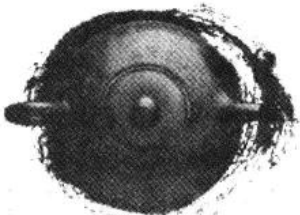


滋味

与50位文化名人聊天

张继合◎著

名人也是人，也有各自的喜、忧、愁、苦……
启功、钟敬文、臧克家、袁世海、乔羽、丁聪、余秋雨、冯骥才、李维康、铁凝……都是名人。
名人观世象，总会有些「标新立异」的视角……
不聊不知道，「心」路真奇妙……
听，名人倾诉，既受教益也是享受。



滋味

与50位文化名人聊天

张继合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滋味:与 50 位文化名人聊天/张继合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4(2009.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80171 - 276 - 9

I. 滋… II. 张… III. 文艺工作者—访问记—中国
IV.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0153 号

书 名	滋味:与 50 位文化名人聊天
作 者	张继合
责任编辑	钟 艺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邮 编	100009
印 刷	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8.25
字 数	236 千字
版 次	2009 年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8.00 元



目 录

目

录

老愈弥坚

公木:我永远的恩师	(1)
年根里的臧克家	(17)
桑乾河,明媚的阳光 ——丁玲、陈明夫妇最快乐的日子	(22)
钟敬文:一个世纪的沉思	(27)
王朝闻的幽默	(32)
“看风景”的卞之琳	(38)
已成走影,卞之琳	(42)
“看问题”的施蛰存	(45)
贾植芳:步步是传奇	(50)
吴祖光:在新凤霞走后	(54)
文怀沙:笑谈“风骚”	(59)
《白毛女》中的“三老”	(64)

1



音乐翘楚

- 命好的“乔老节” (70)
- 王立平:多情的音乐人生 (75)
- 张藜:少年功夫老始成 (80)
- 韩静霆想有“三辈子” (85)

艺苑精英

- 袁世海的“戏中戏” (90)
- 欧阳中石:一往情深说京戏 (95)
- 凡有井水处,皆听单田芳 (100)
- 李默然:老而弥坚 (106)
- 李世济:无愧程砚秋 (111)
- 王玉馨:河北梆子的“革新派” (116)
- 裴艳玲:清纯坦荡闯江湖 (121)
- 梨园双璧:李维康 耿其昌 (127)

书画名流

- 快乐的启功 (132)
- 天下谁人不识“丁” (138)
- 含蓄、幽默的方成 (145)
- 韩羽:玩出来的大师 (150)



黄绮:几笔挥来魑魅惊 (155)

秦淮河上的莱阳人——忆明珠 (161)

文坛百家

“文化剑侠”何满子 (166)

李国文“妙语录” (171)

牧惠和枪 (175)

从不屈服的邵燕祥 (179)

林斤澜:关注小说 (184)

蒋子龙:一颗社会的良心 (189)

从维熙:含泪说孙犁 (194)

钟鼓楼·刘心武 (199)

余秋雨访谈录 (204)

铁凝:苦恼中的快乐 (209)

面对“上帝”的周国平 (215)

冯骥才:阔大的文心 (220)

冯骥才:从“卫慧”们说起 (224)

林非:一蓑烟雨任平生 (229)

邓友梅“杂说” (235)

陆文夫:远离电视 (240)

叶辛“触电” (245)

舒乙:导游中国现代文学馆 (250)

我尽量(代跋) (255)



· 老愈弥坚 ·

公木——我永远的恩师

公木——我永远的恩师

人比山高，脚比路长。

——公木

以诗为生命，是二流诗人，
以生命为诗，是一流诗人。

——公木

①

在我所结识的文化名人里，公木先生对我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是他给了我学习深造的机会，是他让我见识了战士的执着、诗人的才情以及教育家的人格魅力。

（一）初谒师门

1990年夏天，我在河北辛集中学复读时，认识了教授作文



的陶昆仲和辛集市文化馆的张诚两位先生,后来他们又把我引见给了远在长春的公木先生。由此,我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

1992年5月,我到长春市的吉林大学参加文学特招考试,也就是那时,我第一次拜见了公木先生。当时,我只拎着一点家乡的红枣、香椿和小米之类的土产,在陌生的东中华路上徘徊。据说,这个路段居住着很多著名的教授,俗称“柳条路十八家”。公木先生的寓所就在其中一座黄色老楼的二层。走近,见门口贴着一张字条:“下午三时会客”。而此刻正是正午时分,我实在是不知进退。

正在犹豫,门开了,一位戴着深蓝色圆帽子的老先生出现在我面前,看样子他是要出门散步。当时,我一眼就认出:这就是公木先生。

老人对我的到来没有准备,当我通报名姓后,他急忙往里让,并高声吩咐夫人吴翔准备饭食。饭后,吴翔老师见我来得仓促,便又主动把我留在家里住,她说:“到外面住宾馆,得不少钱呢。”

2

考试很顺利。这期间,我有很多机会和公木老师聊天。他坐在客厅写字台旁的单人沙发里——这是他固定的座位。谈的很杂:诗歌,小说,文艺理论…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:一是对文化的宽容;二是他执着的理想与信仰。

宽容,使我想到鲁迅先生的话:某些批评家还没有看到稿子写的是什麼,就恨恨地研磨,大骂幼稚啊幼稚。这种不负责任的“学阀”作风对文化和学术贻害无穷。

师母吴翔曾对我说过:“青年诗人汪国真一度非常流行,公木先生对此十分好奇。按理说年龄与汪国真相差悬殊的老诗人,犯不着对年轻人那样仔细的研究,但是,他不愿意做人云亦云的表态,而是想亲自读一读汪国真的诗集,看一看究竟好在哪



里。可惜，串了长春的多家书店也没碰到，最后在昆明才买到了一本。那本诗集他认真地翻阅了好些日子。”

公木先生始终认为：“文化应该是多元的。喊了多年的‘百花齐放’，怎么就不允许有主流之外的文化生态呢？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‘朦胧诗’，诗歌界很多人以为是背叛传统的，应该批判。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，口诛笔伐是不起作用的。当我陆续从学生手里拿到一批朦胧诗作的时候，读到的是许多令人欣赏的篇章。这些东西是应该向诗歌爱好者大力推荐的。对于新生的文化现象，主要是引导，而不是扼杀。”

由此，又说到曾引起轰动的吉林大学“北极星诗社”——这个大学生自发的诗歌组织与公木先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他回忆道：“当时，作为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等人，已然被长春市的公安机关注意，气氛很紧张。据说，监狱已经准备好了，时机一旦成熟，马上批捕。中文系专门为此开批判会，我参加了。我先说了‘这些学生宣扬西方诗歌理论，没有遵循民族化创作道路’等等一大套，总之，都是别人批判过的词儿。复述完这些，我话锋一转，又说：‘上述观点都是别人说过的，现在，我谈谈自己的看法。’中文系的老师们知道我要‘袒护’学生了——当然要袒护！他们是年轻的学生，我们是老师。那样上纲上线地对待年轻人就是没有道理。纵然他们在政治观念上有些偏差，也应该允许有重新认识的机会，哪个人没有犯过错误？我们希望别人对自己一分为二，我们对待别人也应该一分为二嘛。”

公木先生做过很多看似“不合时宜”的事：比如，极力推荐自己的学生——青年诗人徐敬亚去北京开会，宣读那篇引发过纷争的论文《崛起的诗群》；再比如，作为“中国新诗奖”的评委，他力排众议，郑重地投了舒婷的《双桅杆》一票……这是他治学与为人的态度，即：不拜神，不拜金；不崇古，不崇洋；不媚时，不媚俗；不惟书，不惟上。



宽容的话题还有不少历史见证人提起过。公木先生曾对将要毕业的学生说：“将来，如果你们作了文化方面的官员，对待文化人一定要宽容。他们一般都很有个性，要原谅他们，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。”

不但是对待别人，对待同自己声息相关的问题他也是这个态度。有一回我问他：“您是《军歌》的词作者。现在，市面上不少音像制品里都把这首歌拿来改编成了摇滚。对此，您为什么不站出来讨个说法呢？”公木先生不赞成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、满城风雨，他说：“一首歌，大家喜欢，爱怎么唱就怎么唱，创作出来就是让社会流传，让群众传唱的。当然，把严肃的《军歌》改编成摇滚很不合适。不过，光凭急着打官司告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还是让时间来检验吧。”

在他的诗作《人类万岁》中，时间被巧妙地比喻成“一把有刺的扫帚”，只要时间“一下决心，什么痕迹也不会存留”。公木先生也会存在无能为力的苦恼，但他决不强求，只寄希望于将来。将来，放逐着命运的不可知，也包含着他的理想。笃信将来的人，永远不会放弃，也永远不甘为悲观主义者。

4

凡是了解公木先生的人，都知道他对个人信仰的忠诚。这种忠诚，不是“极左”式的愚忠，也不是功利性的盲从；他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，而且是基于历史、现实以及个人的经验和渊博通达的文化知识。他曾满意地归纳道：“我在‘左派’里有朋友，比如贺敬之；在‘右派’里也有朋友，比如王蒙。不管文艺主张怎样，他们都是很有才华、很有思想的人。我很高兴能同这些不同色彩的人开诚布公地交流。”

我唐突地问：“您对共产主义，真地那样虔诚吗？”他的脸上立刻显出不高兴的神情，回答的语气很强硬：“你可以拿共产主义不当回事。但是，我信仰；而且会带到棺材里去！”信仰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，其中有人格与尊严，当然不允许怀疑。这是他



的“底线”。

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王小妮曾撰文回忆道：“有一天，在课堂上公木老师讲到了延安，说到毛泽东的伟大，他突然哭了，泣不成声。这使坐在1979年里的大学生们很感意外。我当时非常认真地辨别了讲桌前这位并不高大的老人，结果，我看见了让我震惊的‘大真诚’。真诚，往往可以被比拟为万能的钥匙，它能打开一切锁。”

所谓“大真诚”是非功利的，绝对本色的，同时也是无私的。

据公木先生的老友、著名学者蒋锡金回忆：“（公木出访匈牙利和罗马尼亚）回国刚下飞机，就被戴上‘右派’的帽子。他来到我家，我也讲述了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和感想。公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‘我想告诫你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无论怎样，都不要向党提出翻这个案。你没有做过党务工作，因此不会领会党务工作有多么细密、多么复杂。要翻一个案不简单……我们决不能因一点个人的得失或不平，就去增加党的麻烦。’他说得很真诚，使我感动。”一颗赤诚之心，跃然而出。

王小妮也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公木老师在1958年被定为‘右派’并流放到东北。但多年后直到他离世，他所秉守的，始终是这种透明的真诚。蚌，用几年的时间含住沙子，吐出珍珠来。以公木老师的心境，顽石也晶莹剔透了。”

诗人丁耶和公木先生是我1995年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的介绍人，两位老前辈曾在一起“劳动改造”。在一篇题为《我和丁耶》的文章中，公木先生说：“我在心里说：我们要争口气！几年来，我擦楼梯、打扫厕所，哪里最脏有泥污，就特意把那里擦拭得最干净、最亮堂。咱们这支队伍虽是遭人另眼看待的，但我们应该自觉成为最文明、最整齐、素质最高、贡献最大的劳动大军。”要知道，当时公木先生的脖子上正悬挂着侮辱性的牌子！人们一边唱着公木所创作的歌曲，一边又高喊着“打倒公木”。

即使在那样的“绝境”下，他都没有绝望，而是凭着坚强的信仰与豁达的态度活了下来。

公木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党员。但他被划为“右派”了，党籍也就不存在了。1962年，吉林大学的校长匡亚明破例把戴着“右派”帽子、正在吉林省图书馆接受“改造”的公木先生调到中文系，而且是担任主任。当时，公木先生已经被开除党籍。但是，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党外的人——和大家交流，没有丝毫隔阂。

我在吉林大学时的中文系主任是郝长海先生，他曾亲口讲述过公木先生恢复党籍时的动人情景：“1978年，公木先生向教师党支部提出了重新入党的申请。时隔40年，再次对着党旗宣誓，满头白发的公木哭了，他动情地说：‘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……今天，母亲又宽容地让我回了家……’话到此，他呜咽不已。在场的党员也都热泪盈眶。”

显然，公木先生既不把自己打扮成“文革”的受害者和控诉者，也不想为历史做丝毫的粉饰。此后，又有两位大学老师讲到过这件事。我也曾将这件事附带进了自己的一篇文章，不知为什么，公木先生审读完之后，删去了这部分内容。

6

（二）四年就教

严格地说，我算不上公木先生的学生。他已经不给本科生授课了，招来的研究生也常常是到他家里去听讲。后来，他的精力逐渐不济，系里连研究生也不让他带了。由于彼此熟悉，我才有机会到先生家多一些。这些机会，使我亲自聆听了他的许多教诲，虽说只有短暂的四年，但却将受益终生。

首先是他学而不厌的精神。

刚入学，公木先生就给我打“预防针”：“大学本科四年，基



本接触不了太多的学术问题。公共课,尤其是外语考试那么紧张,如果不抓紧的话,别说读,恐怕许多书目都没有听说过。即使很用功,也只能打一层薄薄的书底子。”

每次与他对坐,先生总是询问开设的课程以及任课教师的情况。他说:“图书馆是个好地方。五四时期的老一代学人都是那里的常客,他们的广博几乎是后人无法超越的。一本书放在哪排书架的什么位置,一篇文章的具体页码,都说得出、背得过。博览群书是作学问的前提基础。即使不作学问,将来从事其它文化工作,也还是离不开读书。中文系适应面很广,但是毕业生的核心任务不外乎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。不懂文化,没有文化,将来怎么工作呢?”

公木先生是位嗜读的老人,他家里的主题就是书。在书的包围下,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摆在临窗的地方,他能一整天坐在那里翻阅、注释、誊写或者创作。80多岁的人,勤奋得像个备考的小学生。有学生问:“您在延安时就是‘鲁艺’的教师,解放后又亲手参与创办东北大学并任教务长,在北京是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,现在已是吉林大学屈指可数的终生教授了,还辛辛苦苦地学啥呀?”先生的回答是:“知识无止境啊。活到老,学到老。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是学习的好时候。”

其次,是他对书的热爱。

书,是公木先生的“宠物”。他曾跟我说起自己的一套心爱的珍藏:“鲁迅先生的手迹,被一个外地朋友借走了。到现在也没有归还。”看他那么惋惜,我就问:“借走了多长时间?”先生叹了口气,说:“已经20多年了。”我惊讶于时隔久远,一套书还深藏在老人的心里。这并不是“抠门儿”,而是所有热爱读书的人所具有的“通病”。

公木先生甚至为自己百年之后的书籍寻找归宿。他曾告诉我:“除了书房里的东西,楼下还有很多呢。我的子女有的学



工、有的学医,没人继承我这些古董。我已经计划好了,我死后,将把书籍全部捐献给老家辛集市,在那里建一座小型的图书馆,供学习和研究的人们查阅,这样利用率会高一些。”

先生曾正告我:“你的知识结构中不能缺少哲学。哲学是一切理论的基础,没有这个思想武器,就不可能在研究与创作领域走得很远。当然,学习不是为了熟知典籍里的教条,而是树立一种独立的哲学思维。”他劝我从哲学 ABC 着手,还送我一本《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》。读过之后,我至今还珍存着。

1993 年,公木先生出版了《第三自然界概说》。尽管这本书仅有十万字的篇幅及一千册的印数,但它却仍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定的反响。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专著,系统地阐述了他所提出的新概念——“第三自然界”:人类通过劳动,从“第一自然界”中创造出“第二自然界”,人类本身便是这个“第二自然界”的主体,并生活于“第二自然界”,而所谓“第三自然界”则是由艺术创作、诗创作推演出来的假说。这个假说的成熟基于老人 30 年的沉思。他实践着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的诺言,并给我以强烈的心灵触动。当他向我赠书时,还说:“出版社不愿意出版这种纯学术性的著作。我知道,出这类书人家是一个钱都不赚的。”他觉得,人家肯出版,就已经是很给面子了。

那么赚钱的书呢?比如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,这是公木先生上世纪 60 年代的讲义,经过系统整理,保留了 34 万字,1994 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。此书面世以来,一直十分畅销,在众多讲解毛泽东诗词的专著中,它是最受欢迎的版本。截至到 2002 年,再版的数量已超过了二十多万册。据先生说,他拿到了一次性稿酬一万元。先生过世后,师母说:“出版社每次再版,都象征性地给几千块钱。”其实,对于钱,公木先生从不计较,在经济方面他从来是个不会算计的人。

先生对名利的态度,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。



与其他人一样，我很不理解他目前的名位。从延安到东北，又受命进北京。结果，官越做越小，地域越来越偏，最后，终老长春。他倒很想得开，笑咪咪地对我说：“关外这片黑土地，僻静，养人。如果我落户北京，就有摆脱不完、纠缠不清的是是非非，累也累死了，根本就活不到现在。其实，地域再偏远，官位再卑微又有什么关系，到哪里都是工作。”

我从先生那里得到许多真实的历史资料，而且多为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，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他的远离政治漩涡的确是明智之举。他说实话，不落井下石；他讲原则，不趋炎附势。具备这种纯粹文化品格的人，往往不为权势所容。

比如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胡风运动。公木先生那时负责作协青年作家委员会的工作，当时主持中央胡风专案的某人通知他说，天津有个叫林希的青年作家，也是个“胡风分子”，应该批判审查。公木先生断然拒绝了。他说，林希初出茅庐，至多认识天津作协的方纪、鲁藜和阿垅，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呀？不应该无证据的乱抓人、乱划什么分子。事后不久，他被调离岗位，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。

再比如，周扬——他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。1957年“反右”，他做了对公木先生很不公正的事；“文革”期间，周扬又成为挨整对象。周扬专案组让公木先生写材料，揭发周的“叛徒特务”问题，但曾被周整过的他仍然敢说：“我不知道周扬是什么叛徒特务，我只知道，他会用人而不能容人。”

站在周扬对立面的是另一位著名作家——丁玲，她曾是公木先生主持中央文学讲习所时的前任所长。据蒋锡金先生回忆，丁玲对公木的评价非常高。

1981年6月，丁玲、陈明夫妇到长春参加鲁迅诞辰百年纪念会，刚到宾馆，丁玲就迫不及待地问起公木。蒋锡金说：“他



的近况不太好,有病,刚出院回家调养。”丁玲说:“请无论如何为我安排一个时间,我要去探望他。”会议期间,丁玲夫妇一起到公木先生家探病,一谈就是一个下午。回到驻地,丁玲叹息说:“我在文艺界认识的人不少,但正直的、真正的朋友屈指算来,尚在人世的也不超过十个,公木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位。在延安,我写过《三八节有感》和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。当时,有人便皱眉头了,并指责我是兴风作浪。毛主席很快听到了这件事,发话了,说:‘现在虽然有解放区,男女之间还未达到真正的平等。有些女同志在三八节发表一些感触,这是很正常的嘛。’结果,到了1957年,这件事又被扯出来了,要批判我,还发了一个‘再批判’的《特辑》。这时,公木站出来:在延安,并没有批判丁玲的运动,哪里来的‘再批判’?他说的是历史事实,后来却给扣上了‘丁陈集团’的帽子。唉!在北京,从延安出来的人那样多,能说这话的却只有一个公木。”

从这些历史碎片来看,公木先生被发配到冰天雪地的长春,远离北京、远离权力中心,倒未必是一件坏事。他对我总结过自己的历史:“人生是一条路,要不断地寻求真理;而不是一条河,随波逐流。在没有找到信仰之前,每个人都是漂浮在河流中;一旦找到了正确的人生目标,才算上了岸,踏上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”为此,先生特意书写了一张斗方赠给我:“生活不是河;是路”。

1996年,我大学毕业向先生辞行时,他诧异地问:“放暑假吗?什么时候回来?”我说:“我已经毕业了,工作还是您写信推荐的呢。这次走了,再见面就没那么随心了。”他感慨万端:“哎呀,四年过得这样快。学生一拨儿一拨儿地走了,我们怎么能不老啊?”这时候,我忽然想起张诚先生的叮嘱:“人到了风烛残年,后辈要备加珍惜。见一次少一次了。”那次,我一整天都守在公木先生家里。中午,师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。餐桌上,



先生说他想吃冀中的小米，随后又说：“河北老家有什么新闻，经常讲给我听听。”

四年前，我投考吉大，第一次来先生家，是他热情地把我让进这间屋子。四年后，还是在这间屋子他又双手合十，恋恋不舍地送我回老家。我想：见面的机会肯定会有，过上两三年，我的工作稳定了，就回来。但谁知——这，竟是永诀！

（三）四面青山侧耳听

公木先生往往被冠以一连串的头衔，第一个称号总要提到“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词作者”。当然，这不是什么职务，而是普通人所没有的特殊荣誉。军歌被誉为“第二国歌”，作为它的作者势必名垂史册。他却并不在意这些，轻松地对我说：“每年八一建军节，都有新闻单位来采访，还是那些话，翻来覆去地讲，我已经没有新东西表达了。其实，我不是专业的歌词作家，如果不是和郑律成住得那么近，如果不是他无意中发现了我笔记本上的诗稿，如果不是当年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恐怕军歌会是另外一种命运。”

1942年5月2日，公木先生应邀赴中央办公楼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。在会议大厅门口，毛泽东曾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写兵好，唱兵好。今后要多写一些。”46年后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签署命令，将公木先生作词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确定为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。但是，由他作词的另外一首著名歌曲《东方红》，对他来说却似乎没有了这样的好运气。

官方的说法：《东方红》的词、曲作者是陕北农民李有源。其实……

李有源的确与《东方红》的诞生有渊源。1942年腊月的一个早晨，李有源挑着木桶往县城走，在一道山坡上见到旭日东